

汪 熙 / 著

求索集

Qiusuoji

Wang X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汪 璠 / 著

F-53

W073

求索集

Qiusuoji

责任编辑 曹培雷
封面装帧 甘晓培

求 索 集

汪 熙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0.25 插页 4 字数 461,000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08-03124-X/K·728

定价 37.50 元

谨献给

爱妻及挚友董幼嫻,感谢她的一片爱心及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序 言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楚辞·离骚》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求索。

若干年来，我“求索”到什么呢？实不敢说。

但人非草木，读读看看，感想还是有的，形诸文字的就是断断续续写成的一些文章。兴之所至，文章中有的观点不一定都与那些已形成的定论合拍，有的甚至引起激烈的争论。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样一个事物应该允许有不同的看法，“舆论一律”并不一定正确，若因此给别人戴上这样或那样的帽子，那就更错了。

其实，我集结这本集子，本身就有点不太寻常。回想起来，我生于乱世；长于日寇蹂躏，国家山河破碎之时；青年时吃了几年洋面包；壮年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等到“史无前例”一来，那日子就甬提了。就这样，一晃几十年，一直等到邓小平他老人家上台总算才松了一口气，让人有了点安全感，觉得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出现了一线曙光。这时我虽已步入苏东坡所说的“早生华发，人间如梦”的境界，但突然感到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冲动。细心的读者也许会觉察到，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发表时间差距很大，大多数都密集在 70 年代以后，大概就是这种“冲动”的结果。

说到这本集子的出版,除了师友们的关注外,我要再一次感谢邓小平他老人家的赐福。他以真正革命家的气魄,启动了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畏艰险,不惧怨诽,大破苟且因循,开辟了一个时代。接下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真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改革与开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上增添上了绚烂的一页。历经磨难的中国,终于在烈火中腾飞起来了——飞出一个金凤凰。中华民族是了不起的,一旦冲天而起,必定一发不可收拾。我在有生之年居然还能亲眼看到这一个百年难遇的大变局,心里躁动难安。往者已矣,怎样才能把失去的岁月夺回来,这倒是我日夜惦记着的事情。记得去年有一位香港报纸的记者在采访我时好奇地问我:“您已年近八旬了,还这么起劲,所为何来?”我沉思了一下说:“自从中国有了改革开放,我的生命就始于七十了,应该做的事太多,好戏还在后头呢!”请允许我把这本集子作为开锣戏奉献给读者吧!

路是漫长的,我将在这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征途上永远前进、求索。

汪 熙

1998年9月于复旦校园

目 录

1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	3
从轮船招商局看洋务派经济活动的历史作用	23
论晚清的官督商办	69
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	118
试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与作用	154
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	175

2

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	233
回顾与前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史的研究	246
回顾与展望:1979—1993 年我国中美关系史研究	255
中美经济关系研究述评	270
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	293
一个国际托拉斯在中国的历史记录——英美烟公司 在华活动分析	348
“门户开放”政策的一次考验 ——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东亚的影响 (1934—1937 年)	390

太平洋战争与中国	438
----------------	-----

3

有关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起义的几个问题	481
---------------------------------	-----

4

论盛宣怀	503
论郑官应	506
论徐润	538
一代宗师陈翰笙	543

5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合作理论	555
离开了空间与时间的结合就是“隔靴搔痒”	560
人才！人才！中国保险业呼唤人才	566

6

读《近代史思辨录》	571
从赫德信函想到的一个呼吁	574
研究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	577
一个立体研究的尝试	580
能看清楚点吗	583
值得探索的“特殊关系”	586
历史是一面镜子	589
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两端	594
美国也有不称心的时候	598
“以夷制夷”失灵了	601

美援的背后·····	605
一台演砸了锅的戏·····	607
美国有个麦卡锡·····	609
从《美国万花筒》说起·····	614
林肯的一封家信·····	617
经济上和学术上的“闭关自守”都不是好办法·····	619
史料·观点·构思·表达 ·····	623
在非经济领域也要有点竞争·····	627
巴黎的小巷文化·····	631
巴黎的地铁·····	633
附录一·····	635
附录二·····	638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

——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 70 年代,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流行观点是:中国社会长时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社会的框架,只有到 19 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这就是费正清建立的“冲击—反应取向”,强调外部因素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2],我们称之为“外因论”。这一主流思想到 70 年代遭到猛烈的挑战。首先发难的是当时的年轻学者佩克,他在 1969 年 10 月发表了《花言巧语的根源:中国观察家之职业意识形态》^[3]一文,以犀利的笔锋论证“冲击—反应取向”是掩盖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强人理论。他的锋芒直指费正清。费正清作了答辩。这就是有名的“费—佩交锋”。佩克批判的主要对象虽是费正清,但笔锋所及,几乎横扫了整个“冲击—反应取向”学派,使当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学术界受到很大震动。然而由于佩克没有建立起较完整、系统的批判理论,所以这次风暴虽对外因论有所触动(包括费正清本人),但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未能持之久远。到 80 年代,费正清的学生柯文经过十多年的构思与钻研,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美国对中国近世与过去的历史论著》^[4]。它的中心思想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他认为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力量会不断为自己开辟前进之路,形

成中国的近代史。这就是所谓“中国中心取向”或称“中国中心观”。它强调中国内部因素,我们称之为“内因论”。柯文一书的特点是把他的理论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他对自 50 年代以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著作(约 120 余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进行了批判,包括他的前辈和老师——费正清。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虽也有一些重大的理论缺憾(下面还要谈到),但他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在较精密和周全的论证上面,并以各种历史事实加以验证,其基础比较扎实。作为“外因论”的对立面,“中国中心观”的问世受到美国史学界的普遍重视。

70 年代末期,莫尔德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日本、中国与近代世界经济》一书^[5],在比较中国和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指出中、日的内部社会结构基本一样,而中国经济发展迟滞,主要是由于西方经济侵略(她称之为“世界经济”)的结果。她反对“冲击—反应取向”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由于中国内部结构的阻力,即所谓“传统社会”各种落后因素产生的阻力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迟滞。莫尔德则相反,强调西方经济侵略这一外部因素(外因),贬低甚至忽视中国和日本的内部因素(内因)^[6]。莫尔德一书的出版也引起了轰动,不仅是因为她向公认的权威挑战,而且因为她的比较研究显得很有说服力。当然,也有人对她的论点持批判态度。其中之一就是柯文。因为莫尔德的论证基本上是从外因论出发,虽然是负面效应的外因论(这是她向费正清正面效应外因论挑战的武器),但毕竟贬低甚至忽视了内部因素。这当然不容于柯文^[7]。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如何才能更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并对之作出科学的评述。我们认为外因和内因这两种取向都不能偏废。须知 19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国家撞击中国的大门,并以各种不平等条约为跳板侵入中国,

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任何外来冲击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有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起作用。中国社会内部自有其运动的规律,它必然会向前运动发展,并且最终决定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与结局。因此观察中国的近代史必须从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着眼,从这一角度看,柯文是对的,而莫尔德理论的缺憾恰恰在此,因为在她的比较研究中,贬低甚至忽视了中日两国内部因素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不能忽视的。例如:在横须贺,在当年美国黑船登陆之处,矗立着一块纪念碑,上有伊藤博文的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日本人认为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同伯理来访不无关联。日本著名的启蒙运动者福泽谕吉就曾写道:“嘉永年间(1848—1854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8]在中国人看来伯理以坚甲利兵强行叩关是一种凌辱,是不能接受的。但日本认为这一外来冲击是促使日本振兴的契机。李鸿章(伊藤博文的对立面)以及以后的中国人,谁也不会想到要为类似伯理的这些外国人树碑立传。这是两种不同的涉外文化心理。传统的文化力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在社会内部却是很重要的内因,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这样说,不是认为外因不重要。相反,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外因(在这里指西方的冲击)也可以成为主要的一面。自道光以后,中国的当局与知识分子都惊呼中国面临“千古变局”。这“变局”与西方的冲击是分不开的。离开了西方的冲击及其影响,很多中国内部的事就无法解释。例如中国近代社会很重要的阶层——买办,是在西方冲击下,不平等条约的产物^[9]。买办阶层的出现及其转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是外国商品冲击中国市场的桥梁,还有一部分则先后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先驱^[10]。他们

的正负作用是中国社会发展与迟滞的一个重要的内因。不研究西方的冲击(外因),便很难理解这股社会力量形成、分化的来龙去脉。又例如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实行了币制改革,放弃了银本位,转变为类似管理外汇本位。中国货币脱离了几千年奉行的银本位,这的确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个“千古变局”。但是中国的货币改革是被迫的,是美国 1934 年的白银收购法案促使世界银价猛涨,日本乘机搞白银走私出口,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的结果^[11]。所以这一重要的内部因素变动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外因促成的。因此,从理论和逻辑上说,莫尔德强调外因的作用也未可厚非。外因与内因不可偏废,这两种取向应有机地结合起来。

研究遵循何种取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估量西方冲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产生的影响与后果。“冲击—反应取向”论者在这一方面的思考大体上分三个层次。第一,非恶性论。他们认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整个经济规模太大,经济自足程度过高,外国经济入侵,即使有破坏,也不会太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许还会有积极作用)。不论是好是坏,其影响作用,犹如“大象耳朵的跳蚤”,无关宏旨^[12]。第二,良性论。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冲击,肯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正面的促进作用^[13]。第三,超级良性论。认为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冲击,其正面作用是完美无缺的,既引进了资本、技术与先进的管理,成为近代工业的先驱,又不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经济,也不摧残中国的手工业。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在中国享受的不平等条约的优惠权利,往往被人们夸大了,而中国的民族企业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同外国资本相抗衡,故中外企业处于共存共荣的状态。西方的投资所得大部仍留在中国进行再投资,不存在资源与财富外流的问题。因此,西方的经济入侵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完全正面的促进

作用。促进作用是如此美好与完备,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超级良性论”,它的代表人物是侯继明教授^[14]。

然而,“冲击—反应取向”的论者必须回答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即:既然西方冲击对中国是无害的或良性的,甚至是超级良性的,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长期迟滞呢?外因论者的答案是:问题出在中国内部。所以,“冲击—反应取向”的学者大多数都是“传统社会”论者的天然盟友,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种种落后因素阻碍了中国社会向近代化的发展。这就是费正清等人所说的,由于中国社会的一种“明显的惰性”,造成“对西方的挑战回应不力”^[15]。这“回应不力”的原因都根植于中国社会内部,主要的因素有:封建社会结构与腐败的官僚体制^[16],政府无能^[17],内外战争频仍^[18],封建文化的阻力^[19],农业技术的停滞不前^[20]。须注意的是,这些虽然都是内部因素,但它们不同于柯文的“内因论”。前者是作为对西方冲击的一种反应而出现的,是消极的、被动的、无所作为的;而后者则是积极的、主动的,不取决于外部冲击而能自我运动前进的。它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社会,而是具有自己运动的能力^[21]。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也是柯文向“冲击—反应取向”挑战的立足点。

对持“冲击—反应取向”观点的人来说,剩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帝国主义”的问题了。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吗?回答如是肯定的,那么它具有帝国主义掠夺与剥削的性质吗?也许有人会回答说根本没有帝国主义,那事情就更简单了——良性的、超级良性的都站得住脚。然而,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美国学术界有像菲尔德豪斯那样从理论上根本否定帝国主义存在的系统论述^[22]。费维恺在 60 年代曾经多次认为把近代中国的政治软弱、经济贫困和文化不协调等归咎于“帝国主义”是在从外国找一个“替罪羊”^[23]。但是到 80 年代,

他的老师费正清却也正式承认有些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可归之为“经济帝国主义”^[24]。

近代中国和西方接触所产生的后果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诚然,这一接触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与管理,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中国走向近代化进程。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而且是非本质的一面。我们不应忘记,自1842年《南京条约》以后,没有一个东西方列强不是通过不平等条约来到中国的。在这个框架中的国际关系,对中国来讲只能是一个不平等的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维护从不平等条约中所获得的权益是东西方列强(包括美国)同中国打交道的基本准则。冲击、反应、内因、外因都是在这一特定的轨道上运行的。这里面没有深奥的理论,只有明明白白的事实和清清楚楚的逻辑。这也并不是什么老生常谈,而是观察中外关系(包括冲击—反应)和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钥匙。假使没有这个不平等条约的“百手巨人”,我们所面临着的中国近代史也许是另一个局面。

说到不平等条约,不能不涉及“政府无能”的问题。挑出这个问题来评说并不是要否定旧中国“政府无能”这个命题,而是因为在这—命题下往往把不平等条约掩盖起来,让它从后门溜走了。有些学者认为享有特权的外国经济势力对促进中国经济近代化起了关键作用。而中国经济落后,主要归罪于政府无能^[25]。这是典型的“冲击—反应论”,即进步的西方冲击,遇到落后(无能的政府)的反应,把事情弄糟了。德恩伯格教授指出:“中国政府它自己才是经济发展最大的和最显著的障碍。它未能创造一个有利的法律、财政和经济的环境来支持中国现代因素的出现”^[26]。很显然,德恩伯格教授立论的缺点是把中国政府当成一个主权完整的政府,其实不是的。在不平等条约的枷